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指導老師：巫麗雪

臺灣工作貧窮之影響因素

Analysis of Factors that Affect Working Poor in  
Taiwan

學生：簡宜瑾撰

中華民國一一〇年十月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臺灣工作貧窮之影響因素

Analysis of Factors that Affect Working Poor in  
Taiwan

學生：簡宜瑾撰  
指導老師簽名：

中華民國一一〇年十月

系所章戳：

## 謝辭

時間過得好快，一轉眼就到了交稿日前，看著大三學弟妹們既興奮又焦慮地在尋找論文指導教授，我才恍然發現時間已經過去一年了。回想這一路走來，從尋覓指導教授、討論論文方向開始，到後續的論文撰寫及無數次碰壁卡關，無論是處於哪一階段，對我而言都充斥著焦慮、迷茫與壓力。即使如此，這段徬徨不安的學士論文之旅也讓我學到了很多，並且交出了一點點結果；而這個結果是由很多很多人的幫助及鼓勵才得以孕育出來的。

在所有幫助過我走完論文旅程的人之中，首先我最想感謝的人是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巫麗雪老師。謝謝老師不厭其煩的為我解答我在論文及統計上遇到的問題，即使老師自己也有很多事情要忙，但每當我有任何疑問時，老師總是會溫和、耐心且又不失專業地引導我，讓我能在一次次的討論與修正中學會如何做研究及撰寫論文。除此之外，在我因為研究分析結果不理想而感到焦慮時，老師的鼓勵與安慰也給了我很多很多力量；如果沒有老師指導與陪伴，就不會有現在的我以及這篇論文，真的非常謝謝老師！

接下來我想感謝的是願意擔任我學士論文回應人的沈庭瑜學姊，謝謝庭瑜學姊願意當我論文的回應人，並且還主動提出可以約時間讓我練習如何進行論文發表，在看到這個訊息的當下我真的非常感動，心想自己怎麼這麼幸運，可以遇到這麼好的人；明明學姊也有很多學業上及助教的事物要忙，卻還是願意花時間給我建議、鼓勵及幫助，真的很感謝學姊！能認識學姊真是太好了！

再來，我想感謝在學士論文中同組的亦如、育瑄、念臻、心瑜、渝雯、昱君與逸汝；以及雖然不是同組但依然關係緊密的名旖與睿煖，和你們一起吃飯、聊天以及抱怨論文的時間，是我在充滿壓力的這一年中為數不多的快樂時光。和大家一起往前邁進的感覺真的很棒，謝謝你們願意讓我成為同溫層小圈圈的一份子，同時也讓我明白，自己從來不是一個人在面對一切不安與徬徨，衷心地感謝我的生命中能夠有你們。

另外我要感謝我的父母與兄嫂，謝謝你們體諒我因為學業忙碌的關係，無法常常回家陪伴你們；並願意在我感到焦慮和暴躁時，給我一個避風港，提醒我即使很忙也要按時吃飯、希望我能早點休息並照顧好自己。因為有你們的愛，我才能一直無後顧之憂的向前，感謝這一切，我愛你們。

人生很長也很短，我很幸運在寫論文的過程中得到上述這麼多貴人的幫助與陪伴，你們是我論文之旅中最珍貴的寶藏。最後回顧這一切，或許這篇論文並不是那麼完美，但我還是想告訴自己，謝謝你這段日子付出的努力，結果不盡理想也沒有關係，帶著這些學習到的養分繼續往前走吧！

## 摘要

過去對於工作貧窮的研究顯示，教育程度和工作貧窮間呈現負向關係；然而隨著 1990 年代台灣高等教育的擴張，高教低就及學用落差等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狀況，以及因其所衍生的失業、低薪及貧窮現象逐漸受到社會的關注；上述現象顯示高教育不一定代表不會落入貧窮。因此，本研究聚焦於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是否可視為個人落入工作貧窮的成因、世代的差異對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及工作貧窮間的關係有何影響，以及原生家庭社經地位是否會透過教育這個管道，影響個人的工作貧窮風險這三點；以次級資料分析法來分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2019 第七期第五次：社會不平等組」的資料，並使用統計軟體 SPSS 25 進行統計分析。

本研究主要研究發現：

- 一、相較於適量及過量教育者，不足教育者比較容易落入工作貧窮。
- 二、教育與職業相稱度和工作貧窮間的關係，不因高教擴張世代條件不同而有所不同。
- 三、教育年數可以中介原生家庭社經地位對工作貧窮的影響；代表家庭背景異質性可能會透過教育這個管道，對個人工作貧窮風險產生影響。

**關鍵字：**工作貧窮、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不足教育、過量教育、高教擴張

## 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working poor has shown a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the working poor. However,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a person with higher education is free to fall into poverty. Higher educational expansion in the 1990s caused a mismatch between educational certification and job requirements in Taiwan, such as over-education may incur unemployment, low wages, and poverty.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job mismatch on the working poor and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impact of the cohor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job mismatch and working poor,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ducation to passage the advantage/disadvantage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to sink into the risk of working poor. Binominal logit models were applied to examine the hypotheses, based on data from “2019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Social Inequality Module” by the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 25.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First, compared to those whose education was proportional or excessive to the job requirements, those with under-education we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in working poor. Howev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ducation-job mismatch and working poor did not vary by cohort. Last but not least, education was a passage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to the working poor.

**Keywords:** Working poor, Education-job mismatch, under-education, over-education,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 目次

壹、緒論.....	1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研究目的.....	2
二、研究的重要性與價值.....	2
貳、文獻探討.....	4
一、教育與職業不相稱.....	4
(一)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相關理論.....	4
(二)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定義與測量.....	4
(三)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對工作收入之影響.....	5
二、工作貧窮.....	6
(一)工作貧窮之理論背景.....	6
1. 人力資本論.....	6
2. 雙元經濟理論與勞動市場分隔理論.....	6
3. 技術配誤論.....	6
(二)工作貧窮之定義與測量.....	6
1. 工作之認定與測量.....	7
2. 貧窮之定義與測量.....	7
3. 國內研究者對工作貧窮之定義與測量.....	7
4. 國內工作貧窮影響因素之研究.....	8
三、教育與職業相稱度和工作貧窮之連結.....	8
(一)勞動市場高等教育供需不平衡.....	8
(二)原生家庭社經地位異質性.....	8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10
一、資料來源.....	10
二、研究對象.....	10
三、變項之定義與測量.....	10
(一)依變項：工作貧窮.....	10
(二)自變項.....	11
1. 教育程度.....	11
2. 職業聲望.....	11
3. 教育與職業相稱度.....	11
4. 原生家庭社經地位.....	12
(三)控制變項.....	12
1. 性別.....	12
2. 年齡.....	12

3. 現居地.....	12
(四)調節變項.....	12
1. 教育擴張前後世代.....	12
(五)中介變項.....	13
1. 教育年數.....	13
四、研究架構、研究假設與分析方法.....	13
(一)研究架構.....	13
(二)研究假設.....	13
(三)分析方法.....	14
肆、研究結果分析.....	15
一、工作貧窮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15
二、台灣工作貧窮之邏輯迴歸分析.....	16
(一)基本變項對工作貧窮現象之影響.....	19
(二)教育與職業相稱度對工作貧窮之影響.....	19
1. 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影響.....	19
2. 世代對相稱度和工作貧窮間關係之影響.....	20
(三)原生家庭社經地位對工作貧窮之影響.....	20
伍、結論與檢討.....	22
一、工作貧窮影響因素之結論.....	22
二、研究檢討與限制.....	23
陸、參考書目.....	24

## 表目次

表 3-1 工作貧窮之次數分配表.....	11
表 3-2 教育與職業相稱度之次數分配表.....	11
表 4-1 工作貧窮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15
表 4-2 工作貧窮之二元邏輯迴歸分析.....	17
表 4-3 教育與職業不相稱與工作貧窮之關係.....	20
表 4-4 社經地位、教育年數與工作貧窮之二元邏輯迴歸分析.....	21

## 圖目次

圖 3-1 研究架構.....	13
-----------------	----

# 壹、緒論

##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 (一)研究背景

隨著 1970 年代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與擴張，各國政府透過逐步解除金融管制等手段吸引外資及企業進駐國內，以追求經濟成長。金融管制解除後，在全球化之國際貿易與國內市場競爭壓力下，企業為了節省人力成本以提高獲利，發展出派遣制與外包制等非典型就業模式，後續引發了諸如貧富差距擴大、大量失業、低度就業與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等，和貧窮有關的社會議題。

在台灣，社會大眾大多傾向於認為，一個人會落入貧窮的原因，是由某些特殊的個人因素所致，如貧窮者多為老弱病殘等依賴人口，或貧窮者缺乏工作動機、不願意找工作或不努力工作等(葉炫偵, 2011)；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下，似乎暗示著：只要一個人有工作並且努力工作，就能使其脫離或免於貧窮。這也是近年來政府致力於降低失業率的策略之一，彷彿只要幫助貧窮者脫離失業的狀態，就可以達成幫助他們脫貧目標；然而，「工作」和「貧窮」間的關係真的如此單純嗎？

事實上若對台灣勞動市場內部進行觀察可以發現，在勞動市場最底層，有許多勞動者屬於工作貧窮者，即為俗稱的窮忙族或窮苦族。工作貧窮現象的發生，代表就算一個人有特定工作，仍有可能會受許多社會結構或非結構因素的影響而落入貧窮。那麼，究竟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個人是否成為工作貧窮者？

關於工作貧窮現象的成因，目前已有相當多的研究與討論(趙秋雲, 2013；何青穎, 2014；黃惠玲, 2006)；而在這些研究工作貧窮成因的文獻資料中，教育程度皆被證實是影響個人是否存在高工作貧窮風險的因素之一(趙秋雲, 2013；何青穎, 2014；羅婉云, 2007)。以羅婉云的研究為例，他以 2004 年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之資料為樣本，對台灣工作貧窮現象進行量化分析。其研究結果發現，當教育程度愈高，個人落入工作貧窮的風險也就愈低；這項研究結果也符合大眾對教育的認知與期待—意即一般而言，當個人教育程度越高，其出社會後的工作就會越好，因此也就較不容易成為工作貧窮者。而教育的社會功能，也在於使人可以達成垂直的階級流動。

然而，隨著 1990 年代台灣高教擴張政策之實施，高等教育逐漸普及；與此同時，在 1990 年代產業結構變遷下，台灣逐漸從以第二級產業為主，轉變為以第三級產業為主的後工業社會。由於第三級產業帶來的職缺比第二

級產業來得少，在職缺減少而國民教育水平又提升的狀態下，勞動市場因此出現高教育程度者從事低職位工作，以及個人科系專業與職業內容不相符等教育與職業不相稱(Education-job mismatch)的現象(王昭容，2000)。

##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聚焦於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是否可視為個人落入工作貧窮的成因；以及社會結構因素，如高教擴張前後出生之世代，對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以及工作貧窮的關係有何影響。在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如何影響個人收入的部分，台灣學者多採用勞動市場高等教育者供過於求之觀點，認為供需不平衡加上職場中高職位數量並沒有增加，使得高等教育者被迫相互競爭，並造成競爭失敗之高等教育者被迫就職於收入較低的低職位，因而形成高教低就的現象(王昭蓉，2000)。基於上述觀點，研究者以高教擴張前後的出生世代作為調節變項，分析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對個人工作貧窮風險的解釋與預測，是否會受到反映機會結構的世代的影響而有所不同。

此外，有學者提出家庭背景及個人特性之異質性，會使個人在教育上所能獲得之資源有所不同，並影響其未來的社經地位報酬(關秉寅、彭思錦、崔成秀，2019)，此觀點和社會大眾對於教育能扭轉階級影響的想像持相反的論點；因此，為了檢視教育和家庭背景異質性對個人工作貧窮風險影響之差異，研究者以教育年數作為中介變項，去分析個人原生家庭社經地位對工作貧窮的影響，是否是因教育年數這項跟學歷有關的管道所完成。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重點為以下三點：第一，在高教擴張後，個人於畢業後第一份工作上若出現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情形，是否代表其之後更容易落入工作貧窮？第二，不同世代間，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對個人工作貧窮風險的影響，是否會有差異？第三、原生家庭社經地位與工作貧窮風險間的關聯，是否會透過教育年數這個變項所中介？這是研究者有興趣且想探討的問題。

## 第二節、研究的重要性與價值

在台灣高等教育普及的現在，學非所用的例子時有耳聞；但是在眾多討論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研究中，大多都將研究重點放在變項測量方法、薪資收入、工作滿意度或失業等層面進行討論(蔡瑞明、莊致嘉、葉秀珍，2005；黃毅志、林俊瑩，2010；王昭容，2000)，將焦點放在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和工作貧窮有何關聯的研究，卻不多見。相較於收入這樣的連續變項，工作貧窮屬於一種界定收入和貧窮間關係的指標，當收入低於某個標準即為工作貧窮者。因此本研究與過去研究不同的地方在於，研究者關注的並非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對薪資收入的影響，而是某些教育與職業不相稱者所面對的低薪現象，是否會使得這些工作者落入工作貧窮。

最後，研究者期望透過本次研究，可以從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角度來看工作貧窮的成因，這樣的研究焦點除了可以促進社會對工作貧窮及教育與工作不相稱之認識，也能使社會大眾得以再進一步去反思，現行教育制度對個人工作貧窮風險之影響，是否有符合大眾對其之想像與期待。

## 貳、文獻探討

### 第一節、教育與職業不相稱 (Education-Job Mismatch)

#### (一)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相關理論：勞動力運用架構

勞動力運用架構(Labor Utilization Framework)是由 Hauser(1974)所提出，主要是將勞動人口依勞動力之運用程度進行分類；其中勞動力未適度運用的，稱為低度就業。針對低度就業現象產生的原因，Hauser(1974)認為，可能的因素有失業、工時不足、低薪以及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等(引述自洪惠芬、李淑容、林宏陽，2014)。

Clogg 和 Sullivan(1983)延續 Hauser 對勞動力運用架構中低度就業的觀點，將低度就業中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概念定義為過量教育，也就是俗稱的高教低就，指高教育程度者從事低職位工作的現象；但在 Clogg 和 Sullivan(1983)的研究中，並沒有包含低教高就的現象(蔡瑞明等，2005)。

#### (二)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定義與測量

國內對於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定義，普遍來說多會從兩個層面進行討論：第一個層面是在技術上的不相稱，指的是在學科專業上學非所用的情形；第二個層面則是教育與職業在程度上的不相稱，即高教低就或低教高就等學用落差之情況(蔡瑞明等，2005)；由於本研究主要的研究重點是放在高教低就與低教高就等，程度上不相稱之現象上，因此筆者將以此定義為基礎進行操作與分析。

在教育與職業程度上相不相稱的測量方法中，可以分為主觀的測量方法及客觀的測量方法。主觀測量方法包含工作分析法、自我評量法；客觀測量方法有標準差法、半標準差法等，以及對上述幾種測量方法之修正，如自我評量標準差法、修正自評半標準差法等(蔡瑞明等，2005；黃毅志、林俊瑩，2010)。

根據黃毅志與林俊瑩(2010)之研究，工作分析法指的是由專家主觀認定不同職業所需之教育年數；雖然此測量方法有特定的標準可以查詢(利用美國《職業名錄辭典》)，但是他也存在同職業內不同工作之內容與其對應之教育程度需求會有很大的變異、以及專家主觀意見的分歧會造成判定誤差等缺點。另一種測量方法為自我評量法，即由工作者對自身職業與教育程度的配適度進行主觀評估，此法可以快速且立即的獲得樣本資訊，但也因為此資訊具有高度主觀性，所以容易高估或低估真實的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程度。

而客觀測量方法中之標準差法與半標準差法的概念很類似，都是先將工

作者依工作所需教育程度分類後，計算實際教育年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或半標準差)，再將平均數加減一個(或半個)標準差作為截點，以此判定個人是屬於不足教育、適量教育還是過量教育的判準。兩者不同的地方在於標準差法比半標準差法來得嚴苛，因為使用標準差法會使不足教育與過量教育的判定人數變少，使真正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人數被低估；而半標準差法則是會使不足教育者、適量教育者及過量教育者的比例太過接近，可能會與實際情況不符(黃毅志、林俊瑩，2010)；此外，過去的研究有對標準差法與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關聯提出質疑，或是認為此種以標準差為截點的選擇並不客觀，且無理論依據(引述自蔡瑞明等，2005)。

自我評量標準差法其實是針對自評法與標準差法的修正，其作法是從工作者的自我評量，即他所做的這個工作需要的教育程度，重新計算所需教育年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以此改善單純用自評法或標準差法的缺點。但是使用自我評量標準差法仍有短處，若是職業類別多，但每個職業類別內的樣本數少的話，就容易出現抽樣誤差，使得抽樣的結果無法反應真實的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情況(黃毅志、林俊瑩，2010)。

有鑑於此情形，黃毅志與林俊瑩(2010)針對自我評量標準差法進行再修正，因而產生修正自評標準差法與修正自評半標準差法。這兩種方法是將所有工作者的教育年數減去自評工作所需教育年數後，計算其平均數與(半)標準差；至於不足教育、適量教育及過量教育的判斷方法，和標準差法相同。

雖然以修正自評半標準差法計算的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可以反應不同職業中過度教育比例之不同，但由於研究者所分析的這份台灣社會變遷七期一次資料檔的問卷中，並無自評工作所需教育程度的問題，因此最後筆者改以職業類別半標準差法作為本次研究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測量方法，意即將工作者依職業聲望分成五層並代表不同(但職業聲望相似的)職業類別，得出不同層級中，教育年數的平均數及半標準差後，以半標準差法界定工作者究竟是屬於不足教育者、適量教育者還是過量教育者。

### (三)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對工作收入之影響

依據黃毅志與林俊瑩(2010)以及蔡瑞明等人(2005)的研究發現，過量教育與不足教育對薪資都會產生負向影響，這樣的影響會隨著控制變項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結果。若控制變項為教育年數，那過量教育會對工作收入產生負向影響；若控制變項改為職業類別，則不足教育會對工作收入產生負向影響。

上述研究結果之可能原因及解釋如下：當控制變項為教育年數時，在相同教育年數下，過量教育工作者的收入會比適量教育來得低，這可能是因為過量教育者職位比適量教育者來得低所造成；反之當控制變項為職業類別

時，過量教育者可能因為在同一職業內職位比適量教育者來得高，使其收入比適量教育者來得高(黃毅志、林俊瑩，2010)。

## 第二節、工作貧窮 (Working Poor)

### (一)工作貧窮之理論背景

國內學者之研究多從人力資本論、雙元經濟理論與勞動市場分隔理論以及技術配誤論等理論角度出發(蕭智中，2003；黃惠冷，2006；趙秋雲，2013)，對工作貧窮現象提出解釋。

#### 1.人力資本論(Human Capital Theory)：

由經濟學中新古典學派提出的人力資本論，是在討論個人在勞動市場中之產出為何會有差異的理論(黃惠冷，2006)。依據蕭智中(2003)所述，相對於傳統經濟學中將勞動視為同質的概念，人力資本論認為勞動具有異質性；透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如教育、在職訓練等，提升工作貧窮者的人力資本，就能助其脫貧。然而，由於人力資本論的論述著重在個人層次，缺乏結構層次的論述，因此此理論也被批評者認為太過個人主義。

#### 2.雙元經濟理論(Dual Economic Theory)與勞動市場分隔理論(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

相對於人力資本論著重於個人層面之探討，雙元經濟理論，以及由其衍伸出的勞動市場分隔理論，主要在討論結構因素對個人勞動所得之影響。

雙元經濟理論將經濟結構分為以價格決定者為主的核心理業，以及以價格接受者為主的邊陲產業；勞動市場分隔理論則以雙元經濟理論的概念為基礎，將勞動市場分為主要部門與次要部門，在主要部門中又分為上下層，上層為白領階級，下層為藍領階級。主要部門與次要部門的差異在於薪資與升遷機會之多寡、工作穩定性與工作條件的好壞等，且兩個部門之間的人幾乎不會流動(趙秋雲，2013)；而相較於男性和年輕人而言，女性及中高齡者，較容易落入次要部門(蕭智中，2003)。

#### 3.技術配誤論：

技術配誤論指的是工作者的能力與工作者所屬經濟體的需求不符的現象，其起因可能來自技術革新或產業區域移轉等，主要是由個人與結構層面相互影響所形成(蕭智中，2003)。

### (二)工作貧窮之定義與測量

工作貧窮(Working poor)在字面意義上是指有特定工作，卻處於相對或絕對貧窮狀態的現象。實際上，過去研究對於工作貧窮的定義和測量，並沒有一個確切統一的標準。因為工作貧窮是由「工作」及「貧窮」兩個不同分

析層次的概念所形成：對於工作之認定，通常是以個人作為分析單位，但貧窮與否卻多以家戶所得為判準(葉炫偵，2011)；因此，如要對工作貧窮進行概念化定義及操作化測量，就要先對工作與貧窮兩個概念進行討論。

### 1. 工作之認定與測量：

國內外學者對於工作的認定，多以全時工作、半時工作或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標準，作為其工作概念之操作化判準。

Kim 於 1998 年提出全時工作的概念，在其定義下的全時工作，指的是一年工作 52 週、每週工作至少 40 小時；雖然全時工作可以反應個人薪資，但因為工作貧窮者在勞動市場中除了要面對低薪壓力外，也存在工時不穩定的問題，因此有國內學者認為，全時工作的判定標準，在工作貧窮者的認定上顯得過於嚴苛(引自蕭智中，2003)。

Acs(2000)之半時工作則是指一年中至少工作 1000 小時，以此為個人是否有工作的認定(引自黃惠泠，2006)。相較於美國勞工統計局對工作之界定為，過去一年有 27 週有工作或找工作的寬鬆標準，以及全時工作的嚴苛標準而言，半時工作對工作的認定較為寬鬆，因此國內有多位學者採用此工作認定(蕭智中，2003；黃惠泠，2006)。

### 2. 貧窮之定義與測量：

過去研究對貧窮的定義與測量方法沒有絕對的判準，貧窮可能是指低收入現象或是社會排除之情況，要使用何種定義端看研究者的需求(羅婉云，2007)。一般而言，貧窮的測量多以家戶所得為分析單位，比如歐盟的貧窮線門檻為低於家戶所得中位數的 60%(黃惠泠，2006)；若要以個人為貧窮分析單位，大多會以基本工資為判定標準，如工作收入低於基本工資特定比例者，即為貧窮者；雖然以基本工資界定貧窮較為簡便，但因為基本工資會受政治因素影響，因此也被過去的研究者認為不適合做為貧窮的判定標準(蕭智中，2003)。

### 3. 國內研究者對工作貧窮之定義與測量：

依據賴郁如(2015)之研究，工作貧窮的定義與測量可以分成個人層次以及個人、家戶層次；個人層次是指以有工作，但個人薪資低於特定水平為標準作為工作貧窮之定義與測量方法，這樣的定義方式較為單純，只考量個人的情況，但卻容易模糊低薪工作者和工作貧窮者之間的界線，造成工作貧窮率的高估。個人、家戶層次則是以貧窮家戶中的工作者作為工作貧窮者之界定，目前台灣的研究者多數都是以個人、家戶層次作為工作貧窮的判準。

國內研究者在個人、家戶層次下，多以家戶均等所得中位數的 50% 為工作貧窮之界定標準(羅婉云，2007；葉炫偵，2011)；而在個人層次中，則以

個人基本所得、基本工資中位數 50%，作為個人是否落入工作貧窮的判準(蕭智中，2003；黃惠冷，2006)。由於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教育與職業不相稱與個人工作貧窮間的關聯，因此決定採用個人層次的工作貧窮判準，以有工作，但個人月收入低於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50%，來界定個人是否為工作貧窮者。

#### 4.國內工作貧窮影響因素之研究

從國內研究者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別等因素，會對個人落入工作貧窮的風險產生影響。在性別方面，相較於男性，女性較容易落入工作貧窮，但是男女工作貧窮率的差異有逐年下降之趨勢(蕭智中，2003)。在年齡方面，黃惠冷(2006)和蕭智中(2003)的研究指出，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相較其他年齡層的人而言，會面臨較高的工作貧窮風險。

在教育程度上，葉炫偵(2011)和何青穎(2014)的研究指出，教育程度和落入工作貧窮風險間，存在負向關係，代表教育程度愈高，個人愈不容易落入工作貧窮。最後，在職業別這個變項中，葉炫偵(2011)與蕭智中(2003)的研究結果皆顯示，從事藍領階級者較容易成為工作貧窮者。

### 第三節、教育與職業相稱度和工作貧窮之連結

教育與職業相稱度和工作貧窮間的連結，可從相稱者與不相稱者在薪資收入上的差異切入。過去與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如何對薪資產生影響的研究，多由勞動市場高等教育供需不平衡，以及原生家庭社經地位異質性這兩個觀點進行解釋(王昭蓉，2000；黃毅志、林俊瑩，2010；關秉寅等，2019)。

#### (一)勞動市場高等教育供需不平衡

王昭蓉(2000)之研究指出，台灣在 1990 年代高教擴張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快速增加，然而勞動市場中高職位數量卻沒有跟著增加，這使得高等教育者必須向下尋求較低的職位，除了迫使弱勢者工作機會減少外，也形成高教低就的現象；而低職位往往意味著較低的薪資，因此高教低就者比過去更容易陷入低薪或失業的困境。除此之外，王昭蓉認為長期陷入高教低就的處境，容易灼傷工作者的工作意志，可能因此缺乏對於未來的、長期的工作抱負。

根據王昭蓉的論述進行延伸，研究者後續以高教擴張前後出生世代作為調節變項，去檢視過量教育者是否會因世代不同，使其落入工作貧窮之風險也有所不同。

#### (二)原生家庭社經地位異質性

除了勞動市場高等教育供需不平衡的觀點以外，關秉寅、彭思錦、崔成

秀(2019)在高教擴張對年輕世代薪資影響之研究中，引用了 Torche (2011)的論述，為研究者在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如何影響薪資，並進而使人落入工作貧窮的連結上，提供了偏向社會學觀點的方向。Torche (2011)認為高教擴張會使得大學水平階層化，原生家庭社經地位高的人會有比較多的機會和能力，可以選擇資源及未來前景較好的校系；反之，家庭社經地位較低者較容易進入資源缺乏的校系。因此，即使一樣是接受高等教育，家庭背景之異質性仍會對個人教育產生影響，並影響個人後續的社會經濟地位(引自關秉寅等，2011)。

Torche 研究之觀點和社會大眾對於教育能使階級產生垂直流動的期待非常不同；基於此研究，研究者想知道原生家庭社經地位和工作貧窮間是否存在關聯，以及如果有關聯，那原生家庭社經地位對工作貧窮的影響，是否會被教育年數所中介。若教育年數具有中介效果的話，代表家庭背景異質性的確會透過教育這個管道，影響到個人出社會後的工作貧窮風險。

##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 第一節、資料來源

本研究採用次級資料分析法，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2019 第七期第五次：社會不平等組」的資料作為分析資料，使用統計軟體 SPSS 25 進行統計分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源於 1985 年，是由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進行的全台灣代表性樣本的調查，每間隔五年會進行同一主題的調查。本研究使用分析的資料是「第七期第五次：社會不平等」，該次調查是由中研院社會所傅仰止教授主持，總共完成 1,926 份問卷（傅仰止，2021）。這份資料檔中除包含受訪者的教育程度、職業內容以及收入等，可供本次研究進行相關研究假設之驗證以外，也是目前釋出的資料中最新的資料，因此，研究者決定使用此資料進行研究分析。

### 第二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 2019 年時處於 18 歲以上，65 歲以下之勞動人口。在扣除現役軍人、學生、家管、身心障礙等非勞動人口後，符合本研究條件之樣本數為 1331 人；為使研究更加嚴謹，研究者也扣除了研究所需變項中存在遺漏值之資料，因此最終的總樣本數為 1061 人。

### 第三節、變項之定義與測量

#### (一)依變項：工作貧窮

本研究從工作貧窮的個人層次切入，以有工作、且月收入低於 2019 年個人每月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1/2 者為分界，作為工作貧窮的操作化定義。研究者依照此定義查詢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報表得知，2019 年年度個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為 302887 元，除以 2 後結果為 151443.5 元(行政院主計總處，2020)。然而，受限於社會變遷資料檔在個人收入的地方，是以 1 萬元做為分組的級距，不是一個確切的數字，研究者無法知道勾選 1-2 萬的填答者之確切薪資到底是多少，因此只好改以個人月收入低於 2 萬元，作為判定個人是否為工作貧窮者的標準。因為這樣的判定方法將判定基準提高至 2 萬，如此操作勢必會使工作貧窮者之人數被高估，因此這點是本研究的研究限制之一。

依照上述定義，本研究之工作貧窮者個數與比例，如表 3-1 所示：

表3-1 工作貧窮之次數分配表

	次數分配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非工作貧窮者	962	90.7	90.7
工作貧窮者	99	9.3	100.0
總計	1061	100.0	

由表 3-1 工作貧窮之次數分配表可知，樣本中的工作貧窮者共有 99 人，占有有效樣本的 9.3%；非工作貧窮者則有 963 人，占有有效樣本的 90.7%。

## (二)自變項

1.教育程度：主要分為國中以下、高中職、大專以上等三個類別，三個教育類別之個數與占有有效樣本之比例分別為：國中以下為 172 位(16.2%)、高中職為 312 位(29.4%)、大專以上有 577 位(54.4%)。

2.職業聲望：研究者將資料檔中之職業碼 ISCO88 轉換成 ISEI(全名為 International Social-Economic Index)指數(Ganzeboom、Treiman，1996)，並以此來代表不同職業類別之職業聲望。

3.教育與職業相稱度：

本研究以職業類別半標準差法，對教育與職業相稱度進行定義及測量，具體操作化方法如下：首先將工作者依 ISEI 職業聲望分成五層（由 0~100 平均分為五層，0~20 為一層、21~40 為一層，其於三層依此類推），而後分別算出不同層級中相應的教育年數(由國小一年級算起)之平均數及半標準差之後，再以平均數加減半個標準差作為教育與職業在程度上相稱及不相稱之截點。因此當個人教育年數低於平均數減半個標準差時，研究者將其定義其為不足教育者；而當個人工作之教育年數高於平均數加半個標準差時，則為過量教育者；教育年數介於正負半個標準差間的受訪者則屬於適量教育者。過量教育、適量教育及不足教育之個數與占比，如表 3-2 所示：

表3-2 教育與職業相稱度之次數分配表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不足教育	299	28.2	28.2
適量教育	525	49.5	77.7
過量教育	237	22.3	100.0
總計	1061	100.0	

由表 3-2 可知，教育與職業相稱度中比例最高的是適量教育者，占有有效樣本數的 49.5%，其次是不足教育者以及過量教育者，分別占有有效樣本數的 28.2%及 22.3%；若將不足教育及過量教育皆視為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話，可以發現這份資料中，教育與職業不相稱者和相稱者的比例，大約各占有有效樣本的一半，分別為不相稱的 50.5%與相稱者的 49.5%。

#### 4.原生家庭社經地位：

關於此變項的操作化，研究者將以美國學者 Hollingshead 於西元 1957 年提出之兩因素社會地位指標，作為社經地位的測量標準。此指標是將父母之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別分別區分為五個層次（教育程度分為國小以下、國中、高中職、大專、研究所；職業類別的分類方式和教育與職業相稱度中，職業聲望之劃分相同），由低到高分別給予 1~5 分，透過加權計算(教育程度\*4+職業類別分數\*7)後，取父母中加權分數較高者作為原生家庭社經地位指數(引自李嘉欣，2018)。經此加權計算而得的原生家庭社經地位指數會介於 11 至 55 之間，研究者取其中位數，將指數落在 11 至 32 的人定義為原生家庭低社經地位者，指數介於 33 至 55 的人則定義為原生家庭高社經地位者。

### (三)控制變項

1. 性別：分為男性、女性；其中男性有 567 位，女性有 494 位；男女性別分別占了總樣本數的 53.4%及 46.6%。
2. 年齡：由於問卷本身並沒有問到填答者在填答問卷時的年齡，因此研究者以調查年減掉出生年作為年齡的定義與操作方法。
3. 現居地：劃分為北部(包含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新竹市、桃園市、新竹縣及宜蘭縣)、中部(包含臺中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南部(包含高雄市、臺南市、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及澎湖縣)、東部及其他地區(包含花蓮縣、臺東縣及其他)等四個區域，四區的樣本數及有效樣本比例分別為：北部有 470 筆樣本(44.3%)、中部有 278 筆樣本(26.2%)、南部有 282 筆樣本(26.6%)、東部及其他地區則有 31 筆樣本(2.9%)。

### (四)調節變項

#### 1.高教擴張前後世代：

台灣高教擴張一般認為是在 1990 年代，而有機會在 1990 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多屬於 1970 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因為此時他們的年齡大約落在 20 歲左右，剛好符合接受高等教育之年齡。因此，研究者將高教擴張前之世代定義為 1970 年代以前出生之世代，1970 年代出生後之世代則定義為高教擴張後的世代。

## (五) 中介變項

1. 教育年數：為問卷中固有之題目，屬於連續變項，其定義為由國小一年級開始算起，個人所受過之學校教育總年數。

## 第四節、研究架構、研究假設與分析方法

### (一) 研究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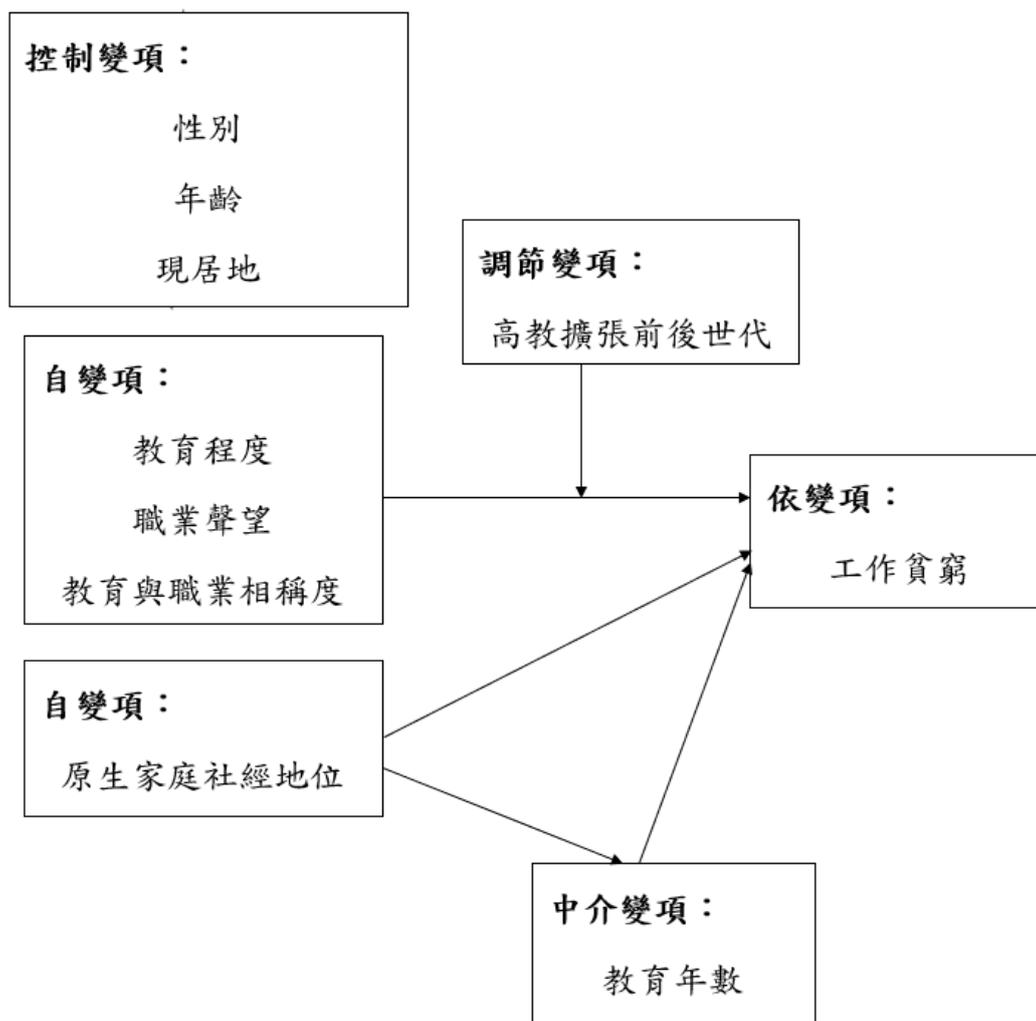


圖 3-1 研究架構

### (二) 研究假設

根據國內對工作貧窮影響因素之研究(葉炫偵，2011；何青穎，2014)發現，教育程度與工作貧窮風險間存在負向關係，即教育程度愈高，個人落入工作貧窮的風險就愈小；基於此發現，研究者認為，由於過量及適量教育者在其所屬職業內，擁有比教育不足者還要高的教育年數，應該較不容易落

入工作貧窮。因此本研究假設：

假設一：相較於不足教育者，過量教育及適量教育者較不容易落入工作貧窮。

在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如何影響薪資的文獻中，王昭蓉(2000)認為高教擴張政策之實施，使得高等教育者在勞動市場中出現供過於求的情形，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因而被迫向下找尋低職位的工作。基於上述研究，研究者認為高教擴張後的過量教育者應會比高教擴張前的過量教育者，在就業與薪資上遇到更多的問題與衝擊，也有更高的風險會成為工作貧窮者，因此研究者提出假設二：

假設二：高教擴張前後世代之不同，可以調節過量教育者對個人工作貧窮風險間的影響及預測效果。

除了高教擴張世代會影響過量教育者對個人工作貧窮風險間的關係以外，關秉寅、彭思錦、崔成秀(2019)認為家庭背景異質性會影響個人教育，促使家庭背景較好的人，可以進到資源豐富之學校與科系，並在出社會後也能獲得較好的社會地位及薪資報酬。根據此文獻，研究者認為原生家庭社經地位異質性對工作貧窮風險的影響，應該會受教育年數中介；代表原生家庭社經地位會透過教育這個管道，影響個人的工作貧窮風險。基於此論述邏輯研究者提出最後一個假設：

假設三：教育年數可以中介原生家庭社經地位對工作貧窮風險的影響。

### (三)分析方法

基於以上假設，在後續章節中，研究者會運用卡方檢定及獨立樣本t檢定進行各變項與工作貧窮間的雙變項分析，以檢視各個變項單獨對工作貧窮之影響；此外，由於本研究之依變項為類別變項，因此研究者會以二元邏輯迴歸之統計方法，在考慮各變項下，分析教育與職業相稱度和工作貧窮間的關係，以及性別、年齡、居住地、教育程度及職業聲望等變項對工作貧窮之影響。

## 肆、研究結果分析

### 第一節、工作貧窮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首先利用卡方檢定以及平均數差異檢定(又稱 t 檢定)，說明性別、年齡、居住地、教育程度及教育與職業相稱度等各個變項個別對工作貧窮之影響。表 4-1 為此部分分析結果之統整。

表 4-1 工作貧窮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非工作貧窮者	工作貧窮者	全部樣本	檢定值
A.應變項	962(90.7)	99(9.3)	1061	
B.非連續變項				
性別				
男性	536(94.5)	31 (5.5)	567(53.4)	21.485***
女性	426(86.2)	68(13.8)	505(46.6)	
居住地				
北部	447(95.1)	23 (4.9)	470(44.3)	20.310***
中部	241(86.7)	37(13.3)	278(26.2)	
南部	248(87.9)	34(12.1)	282(26.6)	
東部與其他	26(83.9)	5(16.1)	31 (2.9)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126(73.3)	46(26.7)	172(16.2)	91.245***
高中職	276(88.5)	36(11.5)	312(29.4)	
大專及以上	560(97.1)	17 (2.9)	577(54.4)	
教育與職業相稱度				
不足教育	245(81.9)	54(18.1)	299(28.2)	40.101***
適量教育	488(93.0)	37 (7.0)	526(49.5)	
過量教育	229(96.6)	8 (3.4)	237(22.3)	
世代				
高教擴張前	293(83.7)	57(16.3)	350(33.0)	29.862***
高教擴張後	669(94.1)	42 (5.9)	711(67.0)	
原生家庭社經地位				
低社經地位	702(88.5)	91(11.5)	793(78.1)	17.309**
高社經地位	218(97.8)	5 (2.2)	232(21.9)	
C.連續性變項				
年齡	41.69(11.8)	49.54(11.3)	42.42(12)	1.062***
職業聲望	42.31(13.22)	33.47(9.68)	41.47(13.19)	18.70***

註：+：p<0.1；\*：p<0.05；\*\*：p<0.05；\*\*：p<0.01；\*\*\*p<0.001 顯著水準。B 表的數值為次數，括號內為列百分比，進行卡方檢定。C 表的數值是平均數，括號內為標準差，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

如表 4-1 所示，本研究之各變項對於工作貧窮的影響，在雙變項分析中皆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由表 4-1 中可以粗略解讀出以下資訊。對性別、年齡及居住地三個基本變項而言，相較於男性，女性更容易落入工作貧

窮(工作貧窮之列百分比為男性 5.5 比上女性 13.8)；工作貧窮者之平均年齡(49.54 歲)顯著高於非工作貧窮者及全體樣本之平均年齡(分別為 41.69 歲及 42.42 歲)，代表年紀較大者在落入工作貧窮上有較大的風險；而在居住地中可發現，居住於非北部地區者落入工作貧窮之比例(分別為中部 13.3、南部 12.1 及東部與其他地區的 16.1)，顯著高於居住地在北部地區的人(4.9)。因此，在性別與年齡對工作貧窮之雙變項分析上，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和蕭智中(2003)的研究相符，即女性與中高齡者較容易落入工作貧窮；而在居住地與工作貧窮的關係上，表 4-1 的結果也與羅婉云(2007)的研究一致，顯示居住於非北部地區之工作者在工作貧窮上會面臨較大的風險。

同樣地，從表 4-1 中教育程度及職業聲望中可以看到，教育程度與職業聲望較高的工作者較不容易落入工作貧窮，此結果也與過去研究之研究結果相符(趙秋雲，2013；何青穎，2014)；而在主要自變項教育與職業相稱度中，不足教育者落入工作貧窮之比例(18.1)，顯著高於適量教育者及過量教育者(7.0 與 3.4)；此研究結果與蔡瑞明、莊致嘉、葉秀貞(2005)之研究中，不足教育會對薪資產生負向影響的結果可以相互呼應。

在世代及原生家庭社經地位與工作貧窮之雙變項分析上，則顯示高教擴張前出生之世代以及原生家庭社經地位低的工作者，較容易是工作貧窮者。對於高教擴張前出生之世代比高教擴張後出生之世代，有較高比例是工作貧窮者的這個結果，研究者認為與年齡有關，高教擴張前出生之世代為 1970 年前出生之工作者，在 2019 年時年齡已是 50 歲以上，而先前研究又顯示年齡為中高齡者較容易落入工作貧窮，因此 1970 年前出生之世代會之後出生的世代，面臨更程度的工作貧窮風險。而原生家庭低社經地位者更容易落入工作貧窮的分析結果，研究者認為能與社會階級的階級複製概念做連結，家庭低社經地位者可能會因各種資本(包含經濟、社會及文化)的缺乏，而使其後代在教育及後續就業上落入較不利的處境。

上述研究結果皆屬於在不考慮其他變項下，對單一變項與工作貧窮間的關係進行分析，這樣的分析結果可能不完全符合現實之情況；因此，接下來研究者將使用二元邏輯迴歸分析，將不同變項納入模型之中，探討在同時考量多個變項下，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對工作貧窮現象之影響。

## 第二節、台灣工作貧窮之邏輯迴歸分析

本研究為了分析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以及其他變項對台灣工作貧窮現象的影響，運用二元邏輯迴歸分析建立 5 個模型，模型的詳細數值如表 4-2。模型 A 單獨放入三個人口變項，分別是性別、年齡以及居住地，藉以分析在未放入主要自變項前，有哪些屬性會增加個人落入工作貧窮的風險；模型 B 將教育程度放入分析模型中，以觀察在性別、年齡及居住地皆被控制的情

表 4-2 工作貧窮之二元邏輯迴歸分析

	模型 A	模型 B	模型 C
性別(男性=0)			
女性	1.04(0.23)***	1.15(0.24)***	1.25(0.24)***
年齡	0.06(0.01)***	0.03(0.01)*	0.05(0.01)***
居住地(北部=0)			
中部	1.09(0.29)***	0.83(0.30)**	0.85(0.29)**
南部	0.95(0.29)**	0.77(0.30)*	0.75(0.30)*
東部與其他	1.08(0.56)+	0.91(0.58)	0.93(0.58)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0)			
高中職		-0.97(0.27)***	
大專及以上		-2.16(0.35)***	
職業聲望 ISEI			-0.06(0.1)***
教育與職業相稱度 (不足教育=0)			
適量教育			
過量教育			
世代(高教擴張前=0)			
高教擴張後			
相稱度*世代			
適量*教育擴張後			
過量*教育擴張後			
Constant	-6.18(0.56)***	-3.45(0.66)***	-3.42(0.72)***
-2LL	577.01	532.88	534.386
Chi-square	81.08***	125.21***	114.70***
Pseudo R <sup>2</sup>	0.159	0.241	0.222
N	1061	1061	1061

註：顯著水準標示如表 4-1。表中數值為迴歸係數，括號內為標準誤。

表 4-2 工作貧窮之二元邏輯迴歸分析 (續)

	模型 D	模型 E
性別(男性=0)		
女性	0.93(0.24)***	0.92(0.24)***
年齡	0.05(0.01)***	
居住地(北部=0)		
中部	1.00(0.29)**	1.00(0.29)**
南部	0.89(0.29)**	0.92(0.29)**
東部與其他	1.00(0.56)+	1.03 (0.56)+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0)		
高中職		
大專及以上		
職業聲望 ISEI		
教育與職業相稱度 (不足教育=0)		
適量教育	-0.55(0.25)*	-0.50(0.33)
過量教育	-1.14(0.41)**	-1.56(0.76)*
世代(高教擴張前=0)		
高教擴張後		-0.76(0.33)*
相稱度*世代		
適量*教育擴張後		-0.29(0.49)
過量*教育擴張後		0.34(0.91)
Constant	-5.14(0.64)***	-2.48(0.32)***
-2LL	566.669	573.79
Chi-square	91.42***	84.30***
Pseudo R <sup>2</sup>	0.179	0.165
N	1061	1061

註：顯著水準標示如表 4-1。表中數值為迴歸係數，括號內為標準誤。

況下，教育程度對工作貧窮有何影響。模型 C 則將模型 B 的教育程度換成職業聲望 (ISEI)，以此分析職業聲望對工作貧窮的影響；模型 D 則是將模型 C 的職業聲望換成主要自變項，即教育與職業相稱度，以檢定教育與職業相稱度跟工作貧窮間的有何關聯。本文之所以會將模型 B、模型 C 及模型 D 分別放教育程度、職業聲望及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原因，是因為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定義及操作化與教育程度和職業聲望有關，因此若將主要自變項和教育程度及職業類別一起放入模型中，這三個變項間很可能會彼此相互干擾並因此影響分析之結果；最後，模型 E 是在檢定高教擴張世代之異質性，是否會與教育與職業相稱度產生交互作用，進而影響到相稱度與工作貧窮間的關係；在上一個小節中有提到年齡和世代間有關聯，因此為防止兩個變項互相干擾，模型 E 中並沒有加入年齡這個控制變項。

## (一)基本變項對工作貧窮現象之影響

性別、年齡、居住地、教育程度及職業聲望等變項，在過去多項研究中已被證實是影響工作貧窮的重要因素(蕭智中，2003；羅婉云，2007；何青穎，2014)，女性、中高齡者、居住於非北部區域(或都市化程度低之區域)、教育程度及職業聲望低的人，有較高的風險會成為工作貧窮者。本研究之模型 A、模型 B 及模型 C 也證實了上述變項和工作貧窮間的關係。

從模型 A 中可看到，在僅考慮基本人口變項之下，女性、中高齡以及住在非北部區域的人比較可能會落入工作貧窮；而模型 B 在加入教育程度後，其模型解釋力由原本的 15.9% 增加至 24.1%，且教育程度在此模型中有較好的顯著性，代表教育程度對工作貧窮而言是一個強烈的影響因素；而兩者之間存在負向關係，代表當教育程度越高，工作貧窮風險就越低。模型 C 則呈現出在控制基本變項下，職業聲望對工作貧窮風險之影響。一般而言，職業聲望越高可能代表個人收入越好，因此更不容易成為工作貧窮者。在表 4-2 的模型 C 中，也能看出當聲望越高，工作者越少落入工作貧窮的趨勢，這代表在控制基本變項下，職業聲望越低的工作者較容易落入工作貧窮。

## (二)教育與職業相稱度對工作貧窮之影響

### 1.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之影響

蔡瑞明、莊致嘉、葉秀珍(2005)之研究認為，工作者的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會造成薪資報酬率降低；研究者從此觀點切入，認為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是造成個人落入工作貧窮的可能因素之一，並以此提出符合人力資本論觀點之研究假設一：相較於不足教育者，適量教育及過量教育者較不容易落入工作貧窮，而此研究假設在表 4-2 的模型 D 中得到證實。

表 4-2 中模型 D 的結果顯示，在控制性別、年齡及居住地等變項下，相較於不足教育者，適量及過量教育者落入工作貧窮的風險較低(迴歸係數為負值)；這樣的結果代表若是工作者的教育年數和同職業中的其他工作者相比屬於較低的狀態的話，此工作者就有比較高的可能性會成為工作貧窮者。

表 4-3 是參考組為過量教育者之邏輯迴歸分析，由此表可看出相較於過量教育者，適量教育者較容易落入工作貧窮，但此關係並不顯著，因此在本研究中過量教育者和適量教育者在工作貧窮風險上，可能沒有差異。

表 4-3 教育與職業不相稱與工作貧窮之關係

	B	S.E.	Wald	自由度	顯著性
女性	.927	.237	15.262	1	.000***
年齡	.047	.011	19.683	1	.000***
居住地(北部=0)			14.111	3	.003**
中部	1.002	.288	12.080	1	.001**
南部	.890	.292	9.311	1	.002**
東部與其他	.995	.559	3.167	1	.075+
不足教育	1.144	.410	7.780	1	.005**
適量教育	.597	.405	2.168	1	.141
常數	-6.284	.628	97.533	1	.000***

註：顯著水準標示如表 4-1。-2LL=566.729；Chi-square=91.554\*\*\*；Pseudo R<sup>2</sup>=0.179；N=1062。此表數值與表 4-1 之模型 D 相同，僅差在教育與職業相稱度之對照組之設定。

## 2. 世代對相稱度和工作貧窮間關係之影響

從表 4-2 的模型 E 中可以看到，在模型 D 的基礎上加入世代及世代與教育與職業相稱度的交互作用項後，交互作用項並不顯著，代表教育與職業相稱度對工作貧窮風險的影響，並不會因為世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研究者之假設二：高教擴張前後世代之不同，可以調節過量教育者對個人工作貧窮風險的影響及預測效果，未獲統計的支持。

會形成此結果的原因，研究者推測可能跟研究者對高教擴張前後世代的劃分不夠精確有關。高教擴張影響較大的時期為西元 1998 年以後，所以西元 1990 年 20 歲的人，和 1998 年時 20 歲的人比起來，在高教擴張對其之影響程度上是有差別的。本研究僅單純以西元 1970 年前後出生作為劃分的標準，可能混雜了不同程度高教擴張世代間的影響，因而使得模型在互動項上不顯著。除此之外，回歸王昭蓉在西元 2000 年的研究，此研究僅指出高教擴張後使得高教育程度者被迫在勞動市場中向下尋求低職位，並使高較低就者收入比過去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得少。然而，收入減少並不代表就會落入工作貧窮，而是收入要少於特定程度(以本研究來說是每個月 2 萬)才會被定義為工作貧窮者；因此高教低就者的收入，雖然比過去受過同等教育的人來得低，但還是高於其他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因而使高就擴張後的過量教育者不至於落入工作貧窮。

## (三) 原生家庭社經地位對工作貧窮之影響

關秉寅、彭思錦、崔成秀(2019)引用 Torche (2011)的研究，認為原生家庭社經地位異質性會影響個人教育資源的多寡，同時也會影響到個人的教育程度，例如低社經地位者大多會讀到高中職、技職等，高社經地位出身者比較有機會進入研究所；並進而影響個人後續的社會經濟地位。這樣的推論意

味著教育可能是階級複製的管道，即使現在幾乎大多數人都有機會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但教育資源仍掌握在出身於高社經地位的人手中，成為其達成階級複製的工具。為了檢驗教育、家庭社經地位異質性與工作貧窮風險三者間的關係，研究者將原生家庭社經地位、教育年數以及工作貧窮三個變項放入迴歸模型中，建立了表 4-4 的模型 F、模型 G 及模型 H。

表 4-4 社經地位、教育年數與工作貧窮之二元邏輯迴歸分析

	模型 F	模型 G	模型 H
性別(男性=0)			
女性	1.00(0.23)***	1.03(0.24)***	1.01(0.24)***
年齡	0.06(0.01)***	0.03(0.01)*	0.02(0.01)*
居住地(北部=0)			
中部	1.00(0.29)**	0.83(0.30)**	0.76(0.29)*
南部	0.87(0.30)**	0.76(0.30)*	0.72(0.30)*
東部與其他	1.05(0.57)+	0.88(0.58)	0.84(0.58)
原生家庭社經地位 (高社經地位=0)			
低社經地位	1.125(0.48)*		0.61(0.50)
教育年數		-0.23(0.04)***	-0.235(0.42)***
Constant	-6.95(0.68)***	-1.73(0.88)*	-2.04(1.06)+
-2LL	547.91	537.04	511.848
Chi-square	87.70***	121.046***	123.76***
Pseudo R <sup>2</sup>	0.178	0.233	0.247
N	1061	1061	1061

註：顯著水準標示如表 4-1。表中數值為迴歸係數，括號內為標準誤。

表 4-4 的模型 F 放入基本控制變項與原生家庭社經地位，單純分析在控制基本變項下，原生家庭社經地位對工作貧窮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在控制性別、年齡及居住地的情況下，出身於低社經地位者，比高社經地位者更容易落入工作貧窮，且高社經地位者與低社經地位者，在工作貧窮的差異上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p-value<0.05)。而模型 G 則是在分析教育年數對工作貧窮的影響，此影響有達到顯著，其結果呈現出當教育年數愈高，個人愈不容易成為工作貧窮者。

模型 H 則是同時在分析控制變項、社經地位與教育年數對工作貧窮的影響。同時比較表 4-4 的模型 F、模型 G 及模型 H 可知，單純考慮社經地位與工作貧窮的模型 F 中，社經地位的影響有顯著；但將教育年數加入模型後（也就是在模型 H 中），家庭社經地位對工作貧窮風險的影響變得不顯著了。這個結果代表教育年數對工作貧窮有很強的解釋力，而原生家庭社經地位跟工作貧窮的關聯，會被教育年數的影響所中介。因此本研究的假設三成立，教育年數會中介原生家庭社經地位對工作貧窮的影響；其代表的意義是原生家庭社經地位可能是透過教育這個管道來影響個人的工作貧窮風險。

## 伍、結論與檢討

### 第一節、工作貧窮影響因素之結論

對於影響台灣工作貧窮的因素，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項結論：

**(一)性別為女性、中高齡、居住於非北部地區、教育程度與職業聲望低者，有較高的工作貧窮的風險。**

研究發現女性、年齡較高及居住於非北部地區者，會面臨較高的工作貧窮風險；此結果符合勞動市場分隔理論中，女性及中高齡者較易進入次級勞動市場，並因此有較差的薪資與福利之結果。此外在控制基本人口變項下，本研究顯示當教育程度與職業聲望越高，個人落入工作貧窮的風險就越低，代表教育程度、職業聲望和工作貧窮間呈現負向關係；此結果符合地位取得模型以及人力資本論之理論觀點，意即個人對教育的投資會影響其出社會後的職業及社經地位。

**(二)相較於適量及過量教育者，不足教育者比較容易落入工作貧窮。**

在控制性別、年齡等基本變項下，相較於同職業中的其他人，若工作者在其職業中屬於教育年數較低或最低的那群人的話，這樣的工作者較容易會落入工作貧窮；研究者認為會產生這樣的結果，是因為不足教育者在其所屬職業內多處於低職位、或為不穩定就業者之緣故。不足教育者在教育年數上可能比適量教育者及過量教育者來得低，在進入勞動市場時可能會因此被迫從事容易被替換或技術含量較低的工作，而這樣的工作通常也意味著低薪、工時不穩定與可替代性高，因而導致不足教育者落入工作貧窮。由於上述研究結果在教育年數對個人工作貧窮的影響上，也採取正面的觀點，因此可視為是地位取得模型之延伸。

**(三)高教擴張世代不會對相稱度與工作貧窮之關係產生影響。**

研究發現，在控制基本變項下，教育與職業相稱度對工作貧窮的影響，並不會因為加入相稱度與世代的交互作用項而產生改變；因此，本研究主要自變項與依變項間的關係，不因世代條件不同而有所不同。

**(四)教育可以中介家庭背景對工作貧窮的影響。**

在控制基本變項下，研究發現教育年數可以完全中介原生家庭社經地位對工作貧窮的影響；這個結果代表的是，在工作貧窮的層面上，教育的影響

力比家庭背景異質性來得大；同時也代表著家庭背景對個人工作貧窮風險之影響，可能是透過教育年數的管道所完成。

## 第二節、研究檢討與限制

本研究在教育與職業相稱度、工作貧窮以及高教擴張前後世代等變項上，皆存在測量上的誤差。由於本研究採取次級資料分析法，受限於次級資料問卷的內容限制，在對教育與職業相稱度進行操作化時，無法獲得問卷填答者的自評工作所需教育程度，並以此教育程度對工作者進行分類，計算實際不足教育、適量教育及過量教育之分界；雖然採用 ISEI 職業聲望作為分類的標準，但仍有可能因此產生概念與操作上的誤差，使教育與職業相稱度無法反應真實情況。

同樣地，本研究在工作貧窮的操作化定義上，也受次級資料問卷內容所限制。由於問卷中的收入是以級距的方式呈現，因此研究者無法知道填答者確切的個人每月薪資總額，這使得研究者在操作時，必須退而以月收入 2 萬元作為工作貧窮者與非工作貧窮者的分界，而非根據原本定義所求得的 12620 元；這樣的操作化方式必定會使得工作貧窮率受到高估，並影響到研究結果。

最後，在高教擴張前後世代的操作化上，研究者以 1970 年出生作為分界標準，此區分方法可能混雜了不同程度高教擴張世代間的影響。高教擴張有很多不同階段，1970 年前出生、1970~1980 年出生及 1980 年後出生者，其所面臨的高等教育擴充程度並不相同，而研究者單純以 1970 年作為分界點的操作，可能使得後續的分析產生誤差並影響研究結果。因此，若是後續有研究想針對台灣高教擴張的影響進行分析的話，研究者建議能將此變項細分為不同程度的高教擴張時期，如此才能使研究更加符合實際情景<sup>1</sup>。

---

<sup>1</sup> 研究者後續有重新將出生世代依據 1969 以前、1970~1977 及 1978 以後出生年進行分類，依此重新建構教育與職業相稱度與高教擴張前後出生世代之交互作用項，並進行邏輯迴歸分析，分析方法同表 4-2 的模型 E，結果發現交互作用項依然不顯著，代表教育與職業相稱度對工作貧窮風險之影響，不因世代條件不同而有所不同。

## 陸、參考書目

### 中文

- 行政院主計總處(2020, 10月)。108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行政院主計總處。<https://win.dgbas.gov.tw/fies/doc/result/108.pdf>
- 王昭蓉(2000)。台灣地區民眾失業率和高教低就之研究。臺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何青穎(2014)。台灣工作貧窮的趨勢分析：1980-2010。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吳德偉(2011)。臺灣工作貧窮者的生活幸福之研究。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碩士論文。
- 李嘉欣(2018)。家庭社經地位、文化資本對國小學童學業成就之影響—以屏東縣為例。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洪惠芬、李淑容、林宏陽(2014)。我工作，但我還是被排除！—低度就業者的工作貧窮困境。當代社會工作學刊，6，124-181。
- 傅仰止(2021)。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2019 第七期第五次：社會不平等組(C00351\_1)【原始數據】取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 黃惠泠(2006)。誰是下一個工作貧窮者？—臺灣勞動結構變遷與工作貧窮現象之發展。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毅志、林俊瑩(2010)。「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新測量與其對工作收入、主觀意識的影響。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0(1)，45-83。
- 葉炫偵(2011)。影響台灣工作貧窮的因素。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
- 趙秋雲(2013)。台灣青年工作貧窮現象。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蔡瑞明、莊致嘉、葉秀珍(2005)。「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對薪資的影響：「標準差法」與「自我評量法」兩種不相稱測度方法之比較。人口學刊，30，65-95。
- 蕭智中(2003)。台灣勞動結構內工作貧窮之現象與變遷 1979 至 2001。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碩士論文。
- 賴郁如(2015)。探討台灣勞動市場中「全時」工作者的工作貧窮現象。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羅婉云(2007)。台灣工作貧窮現象之實證分析。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

文。

關秉寅、彭思錦、崔成秀(2019)。臺灣高教擴張對年輕世代薪資及職業聲望的影響：反事實的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0(4)，555-599。

### 英文

Acs, G., Phillips, K. R., & McKenzie, D. (2000). Playing by the rules but losing the game: America's Working Poor. Urban Institut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rban.org/research/publication/playing-rules-losing-game>

Clogg, C. C., & Sullivan, T. A. (1983). Labor force composition and underemployment trends, 1969-1980.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 117-152.

Ganzeboom, Harry B. G., & Donald T. (1996).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measures of occupational status for the 1988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3): 201-239.

Hauser, P. M. (1974). The measurement of labor utilization: More empirical results. *Malayan Economic Review*, 22, 10-25.

Kim, M. (1998). The working poor: Lousy jobs or lazy worker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2(1), 65-78.

Torche, F. (2011). Is a college degree still the great equalizer?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cross levels of 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3), 763-807.